

民初地方性商业报纸评论特色研究

——以《通海新报》为例

何秋红 高洋洋

摘要：《通海新报》（1913—1929）是民初一份地方性商业报纸，诞生于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南通。通过对该报整个17年办报期间的所有现存资料进行分析，并结合统计的方法，发现该报评论的议题以国家和政治为主，文章以原创为主，稿件来源丰富。从评论的文本内容来看，该报呈现出以下特点：评论言辞犀利，对政府批评毫不留情；客观理性，对爱国运动积极引导；悉心建言，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专业追求，不断提高言论水平。《通海新报》作为民初报刊的一员，其评论既反映了同一时期报纸言论的共性特征，又呈现出一些独特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讲，《通海新报》对于新闻史的意义并不亚于那个时期的其他大报。作为一份地方报纸，其评论的着眼点既有针对性，又没有局限于此，面对国内、国际复杂混乱的局势，该报言论呈现出报人应有的担当。

关键词：《通海新报》；评论特色；文人论政

作者简介：何秋红，女，讲师，新闻学博士。（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226019）

高洋洋，男，广播电视学本科生。（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226019）

中图分类号：G21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7）06-0029-07

《通海新报》创刊于1913年3月18日，最初由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得意门生陈琛（葆初）、林仲希、刘乙青和张佐虞等人合办，报头“通海新报”四个字为张謇所题。该报诞生在非租界，为真正的国人自办商业报纸，采用商业化运作模式，由几人合股创办；它是实业家办报，报纸用来为实业服务。它办报质量高，办报理念、报纸编排、经营管理都较为完善。《通海新报》还具有“商业性”和“革命性”的双重特点，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对研究南通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对研究全国政治经济也起到一定的辅助印证作用。

一般而言，报刊评论代表了报纸的核心价值导向。有学者认为“社论是全报的生命器官”^[1]，有学者将评论称为报纸的“表情”^[2]。民国时期，政论报纸盛行，一个好的评论主笔往往能撑起一家报社，可见评论在那个时代的地位，本文即着眼于《通海新报》的评论部分。

一、《通海新报》评论概况

对于一份出版十几年的报纸，其评论涉及方方面面，运用统计分析不失为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笔者在分析《通海新报》时，就借助Excel进行了统计，主要条目包括作者、体裁、范围和领域。

（一）议题以国家和政治为主

笔者根据每篇文章评论的内容，将其涉及的范围归为地方、国家和国际三类，各项所占比例分别为19%、78%和3%。

《通海新报》虽为一份地方报纸，但其关注点绝不局限于南通本地。相反，评论中涉及“国家”层面的内容高达78%。方汉奇将“文人论政”表述为，“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

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3]作为一份地方报纸，《通海新报》的记者、编辑们也同样秉持着“文人论政”的精神，文章讨论的话题涉及国家总统、外交方针、高等教育、宪法草案、经济发展等方面。

《通海新报》评论板块对国家层面的关注度远高于地方和国际。从 1919 年到 1923 年，这 5 年间关于国家的评论均超过 90%。在事关国家安危、人民生死存亡的关头，《通海新报》从未将自己局限为一份地方“小报”。

民国初年，报刊评论逐渐进入了成熟期。这段时期报纸的大众化、商业化发展不仅提高了新闻内容的广泛性，还客观上促使报刊评论所涉及的领域更加丰富多彩。“社论到这个时候，便有显著的变化……在解释时事方面，已不限于政治一项，对于各种科学，如社会、经济、伦理等等，无所不包。”^{[1](25-31)}

笔者对评论涉及的领域进行了分类统计，结果显示，《通海新报》对于政治领域给予了极高的关注，达到 63.72%，超过其他种类之和。这与当时国内外动荡的局势有关，二次革命、“一战”、护国护法运动、府院之争、五四运动、国共合作等，新生的中华民国遭遇了接二连三的考验。而对于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和战争的关注度都差不多，平均在 7% 左右。

（二）文章以原创为主

民国时期报纸的言论板块一般没有统一的体裁，各种报纸或一种报纸的不同时期，体裁都是五花八门，划分较细。在分析《通海新报》评论的体裁时，笔者发现文章原创的比例非常高。

随着评论范围的拓宽，体裁也越来越多样化。辛亥革命前后，“不少报刊广泛地设置了‘社论’、‘论说’、‘时论’、‘代论’、‘来论’等栏目，时事短评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报刊评论工作的一项重大发展。”^[4]“论说”又被称作“社评”或“社论”。报刊一般以此来发表最具主要性、权威性的观点，以此表明报刊编辑部（或主笔）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时评”也称作时论，通常由报社编辑人员撰写，内容大多依据当期报刊发表的有关新闻而定（也有配合最近发表的新闻报道来加以评论的）。

从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通海新报》的评论主要以“时评”、“评论”为主。通过文章署名等方面进行判断，可以分为内部撰写、外部稿件和其他三类。“内部撰写”包括时评、评论、社论；“外部稿件”包括代论、选论；“其他”包括论说、时论、社说、译论等。《通海新报》评论的内部稿件占比具有绝对优势，达到 92.36%，可见报社还是坚持“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稿件来源丰富

与民国时期报纸一样，《通海新报》的作者通常署笔名，且以单字为主，如“健”、“斧”、“冰”。笔者对作者队伍的构成进行了统计，并列出了稿件数量最多的十几人。

作者	数量（篇）	作者	数量（篇）	作者	数量（篇）
健	1098	无	65	非非	18
其他	471	他	44	杞	17
斧	181	李生	43	进	16
冰	120	恕	37	达	15
可笑	99	王基	28	棠	13
丁瓚	96	悲观	21	克	10

从表中可以看出，《通海新报》整个办报历程的绝对主笔是“健”（刘伟），接近一半（46%）的评论都是他所写。刘伟曾经是海门的举人，在《通海新报》担任主笔长达 13 年（1913-1925）。^[5]

1920—1923年,“斧”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到了1926年,绝对主笔则为“冰”。遗憾的是,“斧”与“冰”的真实姓名笔者无法考证,不过两人的文章风格非常相似,他们主要关注点都集中在“国家”和“政治”两个方面,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和这两个内容完全不沾边的。1927—1928年的主笔为中共地下党员丁璜,其主要使用的笔名有“璜”、“达四”、“慰慈”、“卜菁”、“甦”等。

《通海新报》评论板块的作者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内部人员署笔名。笔者通过观察认为,写稿多的人一般都是内部人员,如“健”、“冰”、“斧”等。(2)内部人员署实名。《通海新报》1918年至1929年的经理葛松亭连续发表了两篇署实名的文章:《我的意见》^[6]和《如何打倒土豪劣绅》^[7]。又如刊载于1927年10月4日的《特派员讹索案的社会暗示》一文,其作者署名为“季膺”,经笔者考证“季膺”真名叫葛季膺,是恽代英的弟媳^[8],署名仅将姓氏隐藏。(3)外部人员署实名。如投稿次数较多的黄康屯、刘光谦,署名为“黄康屯”和“刘光谦稿”的文章分别有12篇和7篇。(4)外部人员署笔名。如在1920年4月16—22日,连续出现4篇署名为“飞飞”的文章(此时为双日刊)。“五四”时期,《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于1919年7月21日创刊,1920年年初被天津当局查封,主编周恩来曾在此刊上以“飞飞”为笔名发表时评。^[9]由于笔名相同、时间吻合、内容相关,故笔者推测这4篇文章的作者可能是周恩来。

与民国时期大多数报纸一样,《通海新报》为增加评论的数量以及内容的丰富度,稿件来源较为多元。(1)报社主笔或编辑撰写。这是《通海新报》评论的最主要来源。清末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重要的位置刊载政论,“报刊评论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成为报刊发行量的一个重要关键,因此,各报都非常重视报刊评论,往往在创刊之前就已经找好固定的撰写评论者。”^[10]《通海新报》设有编辑部,除了采写新闻,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撰写评论。(2)转载其他报刊。转载的范围覆盖国内外报纸,这种现象在创办初期(1913年)较为明显。(3)访员撰写。此类文章较少,或找不到明确证据,目前仅找到1篇,刊于1914年8月1日,署名处为“此稿由访员寄来,不无见及之处因节登之记者识”。(4)读者来稿或约稿。《通海新报》“1917年又扩充版面,由原来的一大张四个版面,变成两大张八个版面”,“大大增加了本地新闻和外县通信。”^[5]为了扩大稿源,《通海新报》还刊发读者来稿或向文笔较好者约稿。(5)直接引用公函、报告书、演说词等。这类稿件一般都被报社归为“代论”一类,可以理解为报社用一些特殊的文章代替自己撰写的评论。

(四) 形式灵活多样

《通海新报》评论的主体风格还是中规中矩的,一事一议。前期文章较短,以文言为主;后期文章篇幅较长,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渐渐偏向白话文。不过,由于作者群体复杂、主笔变动等原因,《通海新报》后期评论的风格还是比较多样的。

1. 口语交谈式

塔尔德认为,“交谈是一个经久不衰、无所不在的媒介,是一条看不见的涓涓细流,它渗透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11]《通海新报》的文体风格在后期丁璜担任主笔时,也开始出现聊天、交谈式的风格,在文章的第一段,通常要解释写作原因,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已经非常口语化了。“最近……而起了值得人人注意的学潮,我但恐一般旁观者,因……仍这样的盲目和武断,所以……写成这篇吾人对于四中此次学潮应有的认识。”^[12]而在文章结尾,作者也似乎“放下身段”,表示以上都只是自己的想法,欢迎读者一起讨论。“这是记者对……的贡献,希望南通各个学生注意才是。南通的学生们,自己起来讨论自身的问题罢!”^[13]

2. 呐喊口号式

1927年一篇纪念孙中山的文章中,作者丁瓚表示要“本着总理不妥协、不屈服、不投降的大无畏的精神,消灭一切虚伪反动分子,而实现总理的真正中山主义的社会,这才是真正纪念总理。”随后则以一段口号结束,“所以我们要努力地喊着:纪念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一切被压迫而革命的民众,团结起来,向一切敌人进攻!消灭一切虚伪反动分子!实现真正的中山主义的社会!”^[14]

3. 诗歌赋文式

丁瓚担任主笔时,社会发生惨案后,会刊发类似悼文的评论。文章与前文说的口语化白话文不同,而是尽可能富有文采,比如1928年的两篇《哀刘桥农民!》和《纪念沙基惨案》。这两篇文章类似于古代诗词歌赋的写法,但又带着时代的烙印:“一阵阵的狂风,一阵阵的暴雨,毁灭了宇宙间一切的清明镇静。……只有任着狂暴的风雨,在马路上咆哮着,东一堆、西一堆的死尸,都饮恨吞声的在马路上僵卧着。”^[15]

4. 论文式

《通海新报》在丁瓚担任主笔时期还有一篇文章比较特别。1926年3月,冯玉祥与奉系军阀作战时,日军舰掩护奉军军舰进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竟联合英、美等8国于3月16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18日,北京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抗议,段祺瑞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通海新报》于18日发表社论《显微镜下的“三·一八”惨案》,文章较长,断断续续分7次刊出。每期的开头会有一个全文提纲,分为9个部分,从绪论、原因、比较到结论,一步步展开,详细分析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

二、《通海新报》评论特色

上文主要针对《通海新报》评论进行统计分析,这一部分将聚焦个体,通过对文章具体内容分析来探析其特色。

(一) 言辞犀利,对政府批评毫不留情

对于民国初年“以禁为放”的禁烟政策,评论直言不讳,“荒谬绝伦,至于此极者也。”^[16]中央的禁烟政策有问题,而江苏、广东、江西的行政长官却“奉行惟谨”,不向中央上报。作者痛陈参议院“千人诺诺竟无一士之谔谔也”,长此以往,人心死尽,国家“虽欲不亡,胡可得哉?”

在南通地方,缉私兵经常“索诈骚扰”,甚至“相率抢劫”。1916年,南通富安镇缉私队光天化日之下“擅搜商店、翻箱倒篋,势等剧盗,私擅开枪、骈伤市民”,当地举行罢市进行抗议。《通海新报》发表评论,不留情面,直指通属营务处处长,“张处长欵,何以整饬军纪,何以福惠平民?拭目延颈俟之。”^[17]

“我国中央政府,只可称之为借债机关,不可称之为政府。”^[18]共和复活几年来,政府除了借债有功,其他别无成绩,这样的政府“尚得称为政府乎哉?不破产何待。”

1928年,时任外交部长黄郛态度亲日,同意日本在“我军积极进攻山东时,日本不出兵,或仅出少量军队,恪守其仅为保护在鲁日侨之精神”。《通海新报》作者举出1904年日俄在满洲开战,“中国民众罹池鱼之殃”进行辩驳,“中国以自己的地方,供人家作战场,自己的人民,倒可不保护,真是荒谬之极。”^[19]

(二) 客观理性,对爱国运动积极引导

1915年,《通海新报》刊载了一篇《第一高等小学校提倡国货之演说辞》^[20]作为代论,对国人的抵

制日货进行声援，并进一步提出“欲抵制日货当先自提倡国货为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抵制日货进入高潮。《通海新报》对于时局的关注度一直很高，就此事连续发表多篇评论。5月14日，健在《抵制日货》^[21]中表示，“凡我国人，固应为同一之主张，对于日本表示敌忾同仇之意。”

几天后，和2012年的西安“9·15”事件一样，抵制过程中有人图谋不轨。针对部分人利用抵制日货进行捣乱，《通海新报》开门见山指出，“抵制日货，爱国之热忱也；捣乱市面，自杀之危道也”^[22]。文中阐明，“已入中国人手之日货，为中国人所有”，焚毁商店里的日货，“承其害者固当然为中国人”。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随后一期，《通海新报》继续发表时评《虚声与实力》，认为抵制日货最好的办法还是“使国货足应社会上需求是也”。笔者认为文章很是精彩，例如：“国民爱国，与其对于日货倡为有形之抵制，不如力为无形之封锁。质言之，即各人本于良心，永远不购用日货，竭力仿造，使国货足应社会上需求是也。能如是，日货自然渐绝迹于市上，虽抱野心，其敢侮予？”

6月20、22日，《通海新报》连发两篇关于学生抵制日货的时评——《告学生》^[23]、《再告学生》^[24]。这里继续对抵制日货进行引导，“游行演讲，灌输智（知）识，不过一种辅佐方法之作用”，文章劝告学生，爱国的唯一方法“在速求工艺上之学识，扩充制造，改良货品”。

12月初，《通海新报》连发4篇时评《正告学生》^[25]，针对当时各地学生抵制日货、游行演说，作者又进行劝说，呼吁救国不能仅仅通过演说，“演说之事，且任高小生为之，若中校以上者，当各出谋实力上之建设”，“实业救国，为今日天经地义不易之策”，“国货充牣，日货自无由乘隙而入，不言抵制，不须演说，自可以经济战胜强邻”。

作为一份南通地方报纸，《通海新报》宣扬的观点受张謇影响很大，其呼吁抵制日货需要发展国货，提倡的“实业救国”也正是张謇所倡导的。在关于抵制日货的评论中，还谈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个观点放在今天仍很有借鉴意义，现摘录如下：“卖买日货与否，乃个人良心上之主张，全属于道德范围，不属于法律范围。即见卖买日货者，当晓譬之，使生羞恶之心；不当强迫之，使起反抗之念。若果强迫，则法律上便无根据，诸生终自取辱已。”^[23]

纵观这些年的《通海新报》，在抵制日货（或其他国家商品）上，持的总立场是反对盲目抵制，号召广大群众理性、务实地进行抵制。

（三）悉心建言，为国家发展谋策略

1918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与中国政府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双方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后签订中日军事同盟新外交案。文章作者直接点明现状：“弱国无外交，有则必损失若干之权利，此为自然之趋势。”当局应考虑清楚，“德俘不必真为我患，日人不必真欲出兵，实无需有此军事同盟之条约，而美名以餍我，轻轻将军权、军港、军厂等一一诈取以去，不待欧战告终，而大好河山于昏昏睡梦中断送也。”^[26]

针对国家工业落后的问题，《通海新报》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国地大物博、原料丰富，农业已占优势地位，“工业之发达，宜乎远驾全球之上。然考之近日，工业之外表似有蓬蓬勃勃之势，而一察看其内容，则颇有旋进旋退之状，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原因：“一曰墨守成法，不求精进”、“一曰目光太近”、“一曰才技不兼全”。^[27]作者列举了“以上数端”，又殷切期待“我全国工界人士，协力同心，以杜绝上列数弊”。

（四）专业追求，对办报经验不懈探索

在17年的办报历史中，有两篇关于报纸编辑方针的文章分量较重。一篇是发表于1919年的社论

《本报今后编辑旨趣之说明》，这是报纸创办6年后针对编辑方针更改的一篇说明：“本报出版，为年者已六。旨趣向趋重于督促政治，改良社会，久已为阅者所共见。”在创刊时，《通海新报》也有一篇关于报纸编辑方针的文章，不过那篇并不属于评论板块，而是一篇“颂词”，文中提到“代表舆论，无党无偏”。在改版说明中，作者阐明，南通一向以实业闻名，“故本报今后对于通海当注重于人民生计之研究。农也，工也，商也，此基本队也。金融状况，其饷也。次以教育类，政治，其辅助机关也。次以官治类、自治类。”短短几句话，作者明确今后报纸将更注重人民的生活，以农工商为报道重点。当然，根据前文的叙述，《通海新报》的重点一直都是国内时政，变化的只是所占比重。

1925年，《通海新报》发表关于地方报办报方针的评论。地方报纸虽然传播范围狭窄，但它的责任还是很大的，地方报刊载的事情要“纤悉不遗”，使人民能通过报纸了解身边的大小事情。地方报发表的言论要有针对性，要贴合地方实际，“于积极方面加以指导，消极方面加以劝戒”。报社还表示因为财力有限，没有做好这几点。《通海新报》还声称要广开言路、不党不偏，“有意见需发表者，苟不悖本报之主旨，本报亦当负宣达之责。持平守正，不偏执私见而为一党所利用。”^[28]

1928年，《通海新报》改组，2月1日发表评论《本报今后的努力》，文章不仅写明“今后所应努力的几点”，还对报纸的使命、报纸是否应该迎合读者的趣味进行了探讨。报纸是时代的产物，人们一日离开报纸，就一日落后于时代，“所以要使阅报者不为时代的落伍者，便是我们的责任。”《通海新报》接受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认为报纸不是特殊阶级的装饰品，也不是记者编辑沽名钓誉的工具，而要做人民的喉舌。报纸还是普及教育的一件利器，“今后本报的文字，务求通俗，对于各种新知识新学说，更要尽力的（地）介绍。”

《通海新报》的评论板块偶尔也会夹带一些“私货”，对出版印刷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说明。《通海人士对于清理沙田之意见（再续）》是一篇长文，共分6期刊出，第3期开头便是对文章中中断的解释，“本论已分载本报四百十三、十四两期，曾属稿未就，以事赴沪，遂致中断。今更续成之，阅者幸谅记者识。”1924年11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只登载了一篇时评，而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没有刊发评论。这篇文章第一段配有解释，“记者因病，已数日不执笔，闻曹锟退位，不得不力疾奋兴，代表国民下一正义之判断。”^[29]

《通海新报》在评论里还不定期设有“校误”栏，纠正往期评论中的错误。1915年9月14和16日都分别纠正前一期排版中的错别字。如：“校误本报十四日时评，‘或衰也’误作‘或口也’，合行更正。”1915年9月28日的时评将作者名字印错，第二天文章前的“勘误”这样写道：“昨九月二十八日，本报时评系范九君投稿，非本报记者所著，校对误认‘健’字暗号，合行声明。”

三、结 语

本文结合近代南通及周边地区发展史来分析《通海新报》的评论特色，对其整个17年办报期间的所有现存资料进行分析，并结合了统计的方法。笔者发现，《通海新报》虽为地方报纸，却在坚持评论针对性的同时，没有把自己局限住，其评论多以国家层面内容为主，关心国内外大事。评论的写作坚持原创，结合报社编辑部与读者投稿，无论评论体裁还是题材均具有多样性和针对性。《通海新报》的评论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仍以国家和地方的政治局势为主，能够抓住时局的重心。

《通海新报》能够担负起新闻媒体的职责。政府做得不对或不好，能够及时发声，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记者们不仅用自己的学识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贡献自己的力量，还能利用好报纸这一社会公器，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同时，《通海新报》也不忘对新闻本身的探讨和对办报的不懈探索。这

些都为当时报纸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耿修业．社论与社论写作 [J]．新闻学季刊，1939（创刊号）：25-31.

[2] [日] 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 [M]．吴文莉译．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3]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

[4]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998.

[5] 何秋红．《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 [D]．华中科技大学，2015.

[6] 葛松亭．我的意见 [N]．通海新报，1927-10-16（2）．

[7] 葛松亭．如何打倒土豪劣绅 [N]．通海新报，1927-10-20（2）．

[8] 红色家书编写组．红色家书 [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9] 方晓红．中国新闻史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19.

[10] 任云仙．清末报刊评论分析 [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5）：51-56.

[11] [法]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 [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7.

[12] 慰慈．吾人对于四中次学潮应有的认识 [N]．通海新报，1928-2-26（2）．

[13] 慰慈．通学联会与沪学联合会 [N]．通海新报，1928-5-18（2）．

[14] 璜．我在纪念总理诞辰时的感想 [N]．通海新报，1927-11-12（2）．

[15] 甦．纪念沙基惨案 [N]．通海新报，1928-6-23（2）．

[16] 健．亡国之征兆 [N]．通海新报，1915-6-6（3）．

[17] 健．对于缉私兵之感言 [N]．通海新报，1916-9-14（3）．

[18] 健．借债机关 [N]．通海新报，1918-1-21（2）．

[19] 慰慈．读“黄外长谈外交方针”以后的感想 [N]．通海新报，1928-4-8（2）．

[20] 第一高等小学校提倡国货之演说辞 [N]．通海新报，1915-5-9（3）．

[21] 健．抵制日货 [N]．通海新报，1919-5-14（2）．

[22] 健．抵制与捣乱 [N]．通海新报，1919-5-23（2）．

[23] 健．告学生 [N]．通海新报，1919-6-20（2）．

[24] 健．再告学生 [N]．通海新报，1919-6-22（2）．

[25] 健．正告学生 [N]．通海新报，1919-12-3、5、7、9.

[26] 健．中日同盟之外交案 [N]．通海新报，1918-5-5（2）．

[27] 植三．我国工业不发达之原因 [N]．通海新报，1924-8-18（2）．

[28] 杞．地方报之责任 [N]．通海新报，1925-4-1（2）．

[29] 健．贿选总统倒矣 [N]．通海新报，1924-11-5（2）．

[责任编辑：赵晓兰]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Commercial Newspapers: Taking the TunghaiSinpao as an Example

He Qiuhong & Gao Yangyang

The TunghaiSinpao (1913–1929) was a local commercial newspaper founded in Nantong, which is known as "the first city in modern China". By conducting data analysis on all issues of the newspaper throughout the 17 years of its existence, combined with statistical methods, this paper finds that commentaries in this newspaper gave priority to national and political topics, with original articles based on an abundance of manuscript sources. By looking at the commentaries published in this newspaper, we can see the emergence of the following features: sharp comments and relentless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 objective rationality, active guidance for the patriotic movement; careful advice and counsel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 pursuit, and the striv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peech. As one of the newspape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unghaiSinpao commented on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spaper's comments in the same period and presented some unique features. In a sense, its news reporting was no less important to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than other major newspapers of that period. As a local newspaper, its comments are focused on both targeted and not limited to the complex and chaotic situatio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